



# 从科学史学到民族主义史学

## ——朱希祖史学思想探析

周文玖

**摘要:**朱希祖是 20 世纪前期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一方面,他主张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跳出党派、民族、国家的偏见研究历史,既考订历史事实,又探究人类进化之律,并把建设科学的史学之理念体现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另一方面,他的论著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史学特色,强调民族气节,阐扬民族精神,心系民族兴亡。并且,他的这两个方面主张既存在张力,又具有统一性。由于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又处在国家危难的形势下,朱希祖史著未能避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

**关键词:**朱希祖;科学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张力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708

**收稿日期:**2023-02-16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朱希祖与民国学术研究”(17BZS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文玖,男,山东金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E-mail: zhouhuadadi@sina.com。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又作逸先、迪先,浙江海盐人,是我国 20 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1905 年至 1909 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其间师从章太炎,受章太炎学术陶炼。1913 年,他代表浙江省参加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因所提注音方案获得通过而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特别是自 1919 年 12 月起,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近 10 年,此后又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 7 年。作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学负责史学教育行政的学者,他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可谓厥功至伟。朱希祖著述繁复,学术涉及面宽广,系被傅斯年誉为“在史学上之建树,当世无多”<sup>①</sup>之学者。他的史学思想,既有强调和实践科学史学的一面,又有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上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一面,在民国史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很值得探讨和深思。

### 一 科学史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

朱希祖是清朝废除科举考试后的第一批留学生。此前他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旧式教育,走的是科举之路,而他留学日本接受的则是西方史学训练。从他现存的日本留学日记可以看出,留学期间,他修习了不少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

回国后,特别是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朱希祖大力倡导科学史学。他每年制定的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贯彻的都是这个思想。他认为:“学史学的须先把史学基本科学学习,然后研究史学方有头绪,如社会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皆为史学基本科学。”<sup>②</sup>“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

<sup>①</sup>傅斯年语,参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编《罗香林论学书札》,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9 页。

<sup>②</sup>《北京大学史学系科目(1921)》,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 页。

学尤为重要。”<sup>①</sup>

1923年2月,朱希祖与李大钊等北京大学教授应邀到武汉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学会作了《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要点》的演讲<sup>②</sup>。他说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点有六:一是旧史学多半偏于政治方面,新史学多半注重社会全部;二是旧史学大概是主张循环说的,新史学大概是主张进化说的,旧史学家所谓黄金时代,是纯粹偏重过去、专事模仿的,新史学家所谓黄金时代,是注重创造、希望未来的;三是旧史学的眼光往往局于有史时代及有史时代中的一时代,新史学的眼光是向有史以前的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下代研究的;四是旧史学的眼光往往局于一部,新史学的眼光则扩充范围及于全部;五是旧史学家往往只管胪列事实,新史学家注重在事实之中求出因果关系,阐明其真相;六是旧史学家往往偏于一个目的,不能完尽天职,新史学家是居于科学的地位,不偏不倚,以求阐明大律的<sup>③</sup>。此演讲内容亦见于朱希祖1921年10月21日拟稿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sup>④</sup>。也就是说,他从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历史观、史学功用、史学旨趣、研究态度等方面比较新旧史学的差异。他的观点当然是扬弃旧史学,倡导新史学。在这里,他再次强调了科学性是新史学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他所说的“新史学”,指的是近代的西方史学。因为他在这篇演讲中,开头即说“近数十年来,西洋史学,日益发达”<sup>⑤</sup>。也就是说,他主张用西方的新史学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这一观点从他给何炳松翻译鲁滨逊《新史学》所写的《序》中也可看得很清楚。他说:“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Robinson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堪的地方摧陷廓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他不仅对德国兰普勒希特的《近代历史学》中的一些观点非常赞同,并据之对北京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即“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而且认为德国Mehlis的《历史哲学》对于“研究史学的人,很有实际的利益”,因此他说:“照这样看来,美国的学说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那末可以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而且他们的学说,殊途同归,都归到社会科学那方面去,可见学问是断不可分国界的。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善纳,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sup>⑥</sup>他在《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中又说:“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sup>⑦</sup>由此可见,他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只有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治史,历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1929年初,朱希祖联络北平六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生,建立了中国史学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为此,他发表了《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其中说道:“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著,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sup>⑧</sup>1929年12月北京大学31周年校庆日,朱希祖发表了《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不仅回顾了自己担任史学系主任所采取的措施,如派遣毕业生到德国留学,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聘西洋史教授翻译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列为史学系必修课,并说这些措施的宗旨都是为了把“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sup>⑨</sup>。

建立“科学的史学”,可以说是朱希祖一贯坚持的史学理念。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专家制定《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作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对该科目表提出了审查意见。他

①《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3)》,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第17页。

②朱偁《先君逸先生年谱》将这一活动置于1923年11月,恐误。参见:张国华主编、海盐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③朱希祖《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要点》,《文史地杂志》1923年第1卷第1期,第233—235页。

④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9日第869号,第3版。

⑤朱希祖《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要点》,《文史地杂志》1923年第1卷第1期,第233页。

⑥朱希祖《〈新史学〉序》,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375、377、378页。

⑦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87页。

⑧朱希祖《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33页。

⑨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30页。

说：“历史学课程，若欲规定原则……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基础。”<sup>①</sup>在1943年4月5日的中国史学会常务委员会上，他又向教育部提出建议案，指出：“非学过社会科学及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则历史观点无由建立，而史料之去取无标准，所重所轻，往往失宜。”<sup>②</sup>

“科学”是日本学者用汉字造的一个词，意为分科有系统之学。中国人最初用“格致学”表达这个意思。严复和梁启超等人的早期著作大都用“格致学”翻译英文 science。但王国维对严复等人的翻译用语并不完全赞同，认为有些翻译词不如日本学者所“造译西语之汉文”贴切，如“Evolution”译为“天演”不如“进化”，“Sympathy”译为“善相感”不如“同情”<sup>③</sup>。他认可日本学者造译的“科学”一词，并提出历史也是一门科学。他在1899年为樊炳清翻译的桑原鹭藏《东洋史要》所写的《序》中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sup>④</sup>“科学”后来逐步取代“格致学”，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词，王国维是有功劳的。在五四运动时期，新派学人一度用 science 的音译“赛因斯”进行表达，但因不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律，最终没有被广大中国人接受，没有流传开来。

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主义主宰了社会，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更是如此。正如胡适所说的：“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sup>⑤</sup>在历史学界，科学主义的影响也显而易见。1902年，梁启超给史学的定义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sup>⑥</sup>五四运动后，他再次给史学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sup>⑦</sup>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到“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从求“公理公例”到“求得其因果关系”，虽然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有所变化，甚至被批评为“倒退”，但其受科学主义的支配和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sup>⑧</sup>。朱希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何炳松，尽管强调历史内容的唯一性，说“历史学是纯粹主观的学问”，最后仍然说“历史还是不失其为一种科学”<sup>⑨</sup>。被朱希祖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的李大钊，也说：“其实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sup>⑩</sup>而朱希祖主张建设“科学的史学”，正是奔腾于这个大潮前面的重要浪花。因为作为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他不仅鲜明地提出建设“科学的史学”，而且将之落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体系<sup>⑪</sup>。

那么，朱希祖的“科学的史学”包含哪些内容？根据朱希祖的相关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研究历史，需用现代科学知识去研究。他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借助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及社会科学，而与历史外部材料上有关系的学科有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年代学、谱系学、古文书学、考古学、统计学，与历史内部组织上有关系的学科则有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文学、哲学，“以上十五种，均为历史最重要的辅助学科”，并且他把前者称为甲种学科，把后者称为乙种学科，认为：“无甲种学科，则历史

① 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37页。

② 朱希祖《建议教育部请在国立各大学分设中国分代史讲座以备完成中国通史案》，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43页。

③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④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谢维扬、房鑫亮等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⑤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40页。

⑥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页。

⑧ 梁启超在游欧之后，发表《欧游心影录》，鼓吹科学破产，却不敢拔弃“因果律”，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参见：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3页。

⑨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1页。

⑩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244页。

⑪ 参见：周文玖《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2期，第20—28页。

材料,无普遍及真确的价值;无乙种材料,则历史组织,无弃取表现的能力;结果毫无发展的可能。”<sup>①</sup>

(2)对历史,要跳出党派、民族、国家的偏见进行研究。他说:“讲学问者不宜有己见,讲历史者不宜有国见、有种见、有教见(男女并重,女子方面历史亦不可忽),至敷陈复仇之义,挑拨杀敌之心,斯为政治家之奴隶,历史家之蠹贼已。”<sup>②</sup>

(3)以现代逻辑方法,考订历史事实。考订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做好这一工作需要运用科学方法,包括分析、综合、演绎、归纳、比较等。这些方法都必须运用逻辑,因此,他把逻辑学视为科学研究的根本。他说:“读史固贵乎怀疑,然必须以科学方法,归纳论理,综合观察,以下判断,庶不致误。”<sup>③</sup>“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决一切疑难。”<sup>④</sup>这里的“论理学”就是逻辑学。

(4)探讨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他说:“历史之职在阐明人类进化之大律,说明人类舒惨之大原,非此则为不称历史之职。”<sup>⑤</sup>“史家最重之职,在明因果之关系,擢社会之真相。”<sup>⑥</sup>历史研究不但要“发明历史真相”,还要“发明历史真理”<sup>⑦</sup>。

朱希祖非常重视直接史料、原始资料以及实地调查。他建议北京大学请求教育部将故宫残存档案划归北京大学,并指导学生整理这批档案的举动,以及许多通过实地考察考辨历史事实的事例,都表明了这一点。他发表《编纂南明史计画》,提出自己撰述南明史的步骤为搜访、鉴别、归纳、编纂。他认为,作史之业,盖有三期:搜罗期、考订期、去取期。三期的要求是“搜罗期务期广博”、“考订期务期精审”、“去取期务期轻重”,三期当循序渐进,既不可躐等以求,也不可一蹴而就。对于史料与著作的关系,他说:“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sup>⑧</sup>朱希祖一生最想完成的系统性著作是《萧梁史》和《南明史》。但由于战争的原因,生活不安定,多年搜求的资料迁藏于他处,他关于一代之史的完整著作最终止步于第二期。

朱希祖的文章大多数属于考证之作。他对历史理论、历史哲学也下过工夫,阅读过德国的历史哲学著作。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史学概论》的讲义,原有第三部分“历史哲学”,后来被他删掉了。他生前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无论是辅仁大学铅印本,还是独立出版社出版本,均没有“历史哲学”部分,在手稿中亦未发现。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他应朱谦之的请求,为其《历史哲学大纲》写了序,但不知何故,此序在该书出版时没有用,内容不详。1938年9月以后,他阅读了诸多哲学、心理学书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兰普勒希特的《历史学》、李石岑的《超人哲学浅说》、高觉敷的《现代心理学》、陈百年的《心理学大纲》等,学术思想出现了较大变化。他对李石岑的著述表现了很大的兴趣,甚至很想结识李石岑。当得知李石岑已经逝世时,他感到非常惋惜:“呜呼!若李君者而早逝,实为吾国哲学界一大损失。学哲学者大都奄奄无生气,倾向于颓废一途。若李君而永年,吾知其必不如此也,惜哉惜哉!”<sup>⑨</sup>他对自己多年偏重考据之学甚至表现了一些懊悔,说:“余治学无恒,十余年前购读之书弃置如此之久,游心琐碎之考据,所得皆断片之知识,于身心家国皆无所损益。”<sup>⑩</sup>

朱希祖对唯物史观抱有一定的偏见,尽管他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唯物史观研究”一课,但在国立武昌高师演讲时,他却说:“近来唯物史家,主张专从经济方面研究史学,这

①知微《畸形的史学》,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1928年11月19日第4期,第4张第14版。按:“知微”是朱希祖的笔名。朱希祖女儿朱倓的《仲娴日记》1928年11月12日记载:“下午与父抄《畸形的史学》一文。此文为父所作,讲历史研究的方法,甚为详析。验证现在一般讲史学及办学校之人不少。此文拟登于下星期一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上。”参见:《朱希祖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43页。

②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9日第869号,第3版。

③朱希祖《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257页。

④《朱希祖日记》下册,第1036页。

⑤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9日第869号,第3版。

⑥朱希祖《中国史学之派别》,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141页。

⑦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37页。

⑧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90页。

⑨《朱希祖日记》中册,第937页。

⑩《朱希祖日记》中册,第937页。

是很不对的;因为社会全部并不是单靠经济就能完成的。”<sup>①</sup>他也购买了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如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费尔巴哈论》,狄芝根的《辩证法唯物论》<sup>②</sup>,但似乎没有认真研习。他主张综合史观,最看重的是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历史的有效工具,“治历史当创一历史心理学以为研究方法,而以价值哲学为评批方法”<sup>③</sup>。由于没有找到揭示历史真理的理论武器,因此,他的科学史学在探索历史进化的因果和本原方面没有取得十分明显的成效。

## 二 鲜明的民族主义史学特色

朱希祖的学生,后成为其女婿的著名史学家罗香林,曾这样评价他:“先生毕生治史,最重气节,明是非……其为人尤重民族情感。”<sup>④</sup>傅振伦也说,先师“最重气节”,“盖习于史而深能力行吾国民族优性也”<sup>⑤</sup>。重视民族气节,心系民族兴衰,是朱希祖史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

朱希祖留学日本时,就开始搜集南明史资料。众所周知,由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南明史在很长的时间成为禁区,资料匮乏,研究薄弱。清末革命党人搜集南明史资料,意在通过南明史撰述,为推翻满洲贵族统治提供精神支持。因此,当时从事南明史资料搜集,包含明显的民族主义成分。顾颉刚说:“南明史的研究,由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刺激,在清末时,对于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已经有人着手,刘师培及邓实皆欲作《后明史》而未成,师培书已由章炳麟预为之作序,最近则以朱希祖先生用力最深。”<sup>⑥</sup>的确,在民国时期,对南明史资料搜集最富、用功最深的非朱希祖莫属。他“致力南明史料搜集,凡三十年,抄本秘笈,无不悉力致之,故收藏颇富”<sup>⑦</sup>。1931年,朱希祖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作序,回顾了自己搜集南明史料的历程。他说:“余自二十五年游学日本,初留意于晚明史籍,其时二三师友,亦尝弘奖斯风。余杭章先生首先传刻张煌言《苍水集》,张斐《莽苍园文稿余》。……仪真刘氏亦颇欲著后明书,预征章先生为序……海内学子,颇多抽其坠绪,广为搜讨。盖读此等书者,皆有故国河山之感,故能不数年间,光复旧物,弘我新猷。”<sup>⑧</sup>也就是说,南明史既是历史研究有待开垦的荒地,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光复旧物”的革命事业。朱希祖一进入历史学领域,就受到民族主义的熏陶,表现出民族主义史学特色。李璜说:“民族主义的史学倾向,自然是造端于清初顾、黄、王三大师,而太炎先生则秉此先导之风,复承浙东学派万斯同、全祖望等参修明史之意,在晚年阐扬民族大义于其欲作之‘后明史’中尽力,惜未就而歿,故其弟子朱希祖本其师志,特别对于南明史事,考订多而且精。”<sup>⑨</sup>清朝被推翻后,南明史的研究风气逐渐沉寂。朱希祖曾指出:“民国既建,海上有《痛史》之刻,有《遗民录》之作,方期此等巨制,日出不匮,俾得汇辑丛残,完成信史,詎料十余年来,此风日就衰歇。盖群众心期,往往随一时之风气,而非思千秋之绝业也。”<sup>⑩</sup>但他并未受此风影响,而是继续把撰写南明史作为一项千秋事业。在研究南明史料时,他很重视以民族气节评价历史人物。如他对姚大荣《马阁老洗冤录》为马士英洗冤深表不满,说:“姚氏承认阮大铖为奸,而谓马士英为忠。忠臣果可以翻先帝逆案,排斥正人君子而孤行己意,拔擢奸臣阮大铖,以覆亡邦家乎?忠臣果可以撤御外之师以平清君侧之内乱而致亡国乎?”<sup>⑪</sup>很可惜的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他的研究写作计划。他很想等抗战胜利了,辞去公职专心撰述南明史,但疾病导致他过早离世,撰著南明史的计划最终没有完成。他去世后,吴稚晖的挽联有一句“人间遽失先生,从此南明无史”<sup>⑫</sup>,对其南明史造诣予以称颂,并表达沉重的悲叹。

①朱希祖《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之要点》,《文史地杂志》1923年第1卷第1期,第233页。

②《朱希祖日记》中册,第949页。

③《朱希祖日记》中册,第921页。

④罗香林《朱希祖先生小传》,载《朱希祖先生文集》第1册,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1页。

⑤傅振伦《先师朱遏先生行谊》,《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11、12期合刊,第53页。

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⑦朱偁《先君遏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6号,第38页。

⑧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88—389页。

⑨李璜《悼念罗香林先生》,罗敬之《罗香林先生年谱》,台湾编译馆1995年版,第224—225页。

⑩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89页。

⑪《朱希祖日记》上册,第344页。

⑫《朱希祖先生文集》第6册,第4384页。

朱希祖重视种族史、民族史研究。他发表的《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考察中国种族的由来,驳斥所谓中国上古土著之民实为苗种、其后汉种来自西方并将苗种赶到南方的说法。他的《史记本纪起于黄帝说》,追溯汉族的起源,寻找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旨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外患没有丝毫减弱。他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危险,20年代即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日本史课程,并演讲《明代倭寇史略》。此外,他还写有《日本名号考》、《丰臣秀吉寇朝鲜》,以帮助学生了解日本历史和近代以来日本侵华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更加严重,他对民族问题、边疆问题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发表有关民族史、边疆地理研究的论文多篇。尤其是他作的《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更是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史学特色。

《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属于文献整理之作,包括辑佚、校勘、辨伪、考证、阐释等,是朱希祖关于宋、金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北宋末至南宋初,宋、金对峙,金先后扶植张邦昌、刘豫两个政权,前者为楚,后者为齐。对这两个政权,《宋史》记载过于简略。朱希祖在王偁《东都事略》,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金国志》,以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著述中,发现了更多的记述,确定宋代存在《伪齐录》、《伪楚录》两书。《伪齐录》内有杨尧弼作的《伪豫传》。朱希祖对《伪齐录》进行校补,对张邦昌传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汇集了金扶植这两个政权发布的诏书、册文、政令,对宋、金史料作了很有价值的发掘。朱希祖之所以从事这一工作,也是感于时势的刺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华北,有学者主张对日妥协,以致以秦桧议和为是。朱希祖对此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晨阅《金史》列传。《仆散忠义传》中载宋孝宗时与金议和,定宋世为侄国。高宗以秦桧议和对金称臣,降为附庸国,仅得梓宫及太后回国,世称梓宫为伪,太后在金早已侮辱不堪,故秦桧卖国实仅得二十余年宰相之威福而已。胡适之不知历史,不知宋高宗称臣,其誓书全文载于《金史·宗弼传》中,彼未尝一读。而近年日本侵我往往袭金故智以和为饵,而使我失其防御,彼则以兵继其后。苟安卖国,自营私利之徒,往往效法秦桧,而适之反颂桧以矜独得,不知彼时金之宗翰、宗望、宗辅、挾懒等健将皆已自相残杀,仅存宗弼,而国中内乱继续不已,长败于宋,乃唆桧杀岳飞,收韩世忠兵权,称臣请和,以保残喘。适之亦欲以今之中国为日本附庸耶?亡则亡耳,犹可恢复,何必为私人权利而奴隶我族类哉?”<sup>①</sup>

《伪豫传》是杨尧弼原题名,然宋人在引用时往往去掉“伪”字,把《伪豫传》改名《刘豫传》,《大金国志》改名《齐国刘豫传》,清朝人曹溶《刘豫事迹》也是根据《伪豫传》并略采他书而成,“与尧弼原始题署舛驰”。其实,杨尧弼原文采春秋笔法,杨氏在《自序》中说:“春秋之法,贱之则书名,削去官秩,除去族氏,以示诛绝,而彰暴罪恶于万世。今豫虽废,得免万死为幸,然尚称伪齐,若不诛绝,何以昭示惩戒,当削其僭号,贬其官爵,除其姓氏,作《伪豫传》。”<sup>②</sup>《伪齐录》一书,在宋代已盛行,并不全出于杨尧弼,而后人却将全书误归于杨尧弼名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书目有《伪楚录》、《续伪楚录》,与《伪齐录》并著,皆不署撰人名氏。《伪齐录》存,而《伪楚录》已亡佚。朱希祖作《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始于1934年7月,至1935年1月已经完成,均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给朱希祖回信说:“大著二种,均即转送敝馆主者。得复,谓同人传观,均甚钦佩,极愿印行,可用四号字排成四开版式,与国立编译馆所著各书同,出版后,按定价以版税百分之十五奉酬等语,谨代达。”<sup>③</sup>朱希祖所写的《〈伪齐录校证〉自序》、《〈伪楚录辑补〉自序》也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5年第2卷第1期发表。但不知何种原因,以后并未见到商务印书馆版本。1942年8月,独立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二书,朱希祖又对它们作了补充和修改。从朱希祖日记和出版后的《〈伪齐录校补〉自序》、《〈伪楚录辑补〉自序》看,《伪楚录辑补》改动较少,补充较多的是《伪齐录校证》,增加了附录,书名由原来的《伪齐录校证》改为《伪齐录校补》。

朱希祖精心辑录、校补的这两本书,蕴涵了他的民族气节和经世用意。他在1934年写的《〈伪齐录校证〉自序》中说:“此虽小史,所以不憚劳瘁,为之考订者,良以伪齐之事,今世可资借鉴,强邻狼吞于外,奸回蠹

<sup>①</sup>《朱希祖日记》上册,第408页。

<sup>②</sup>朱希祖《〈伪齐录校证〉自序》,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64—365页。

<sup>③</sup>《朱希祖书信集·邨亭诗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1页。

于内,如尧弼者,诛绝乱贼,斡旋国交,百世之下,令人兴起,吾愿读此书者,潜神默会焉可也。”<sup>①</sup>在此之后不久,他所写的《〈伪楚录辑补〉自序》又云:“吾为此惧,故既考证《伪齐录》,又辑补此《伪楚录》,以昭操纵伪国者处心积虑之险,而同国之自相屠戮者,愿各鉴此前车焉。”<sup>②</sup>也就是说,他辑录、校补这两本书,意在既揭示外敌建立伪政权的险恶用心,又规劝国内政治势力不要自相残杀。当时国内的形势是日本加紧侵华,而国民党奉“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全力围剿红军。到了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汪伪,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与军事进攻相结合之策略,国民政府在抗战方面表现出消极态势。朱希祖补充修改二书出版,对此前所写的《〈伪齐录校订〉自序》,亦根据时局变化作了稍许变动:“成《伪齐录校补》二卷,别附校勘记二卷。校补存其是以便读,校勘著其非以求真。此虽小史,所以不惮劳瘁,为之考订者,良以伪齐之事,今日可资借鉴。世无尧弼,不能身入沦陷之区,以著僭伪之史。故特表彰此书,以昭告国人,内有以资当局之鉴戒,外有以奖志士之兴起,则此书之考订,亦不为徒劳矣。”<sup>③</sup>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鞭笞伪政权、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兴军抗战的编著宗旨,在此作了更明确的表达,他要做当代的杨尧弼。

在《伪齐录附录目录》中,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识语。他说:“右附录一之五篇,为研究史学之作。附录二之八篇,为研究政治之作,阅者分别观之可也。八篇之作,尤为区区精意所在。探微索隐,陈古鉴今,幸勿作寻常史论观也。”<sup>④</sup>可见,他对附录特别是附录二是很重视的,内中有其鉴往知来的见解。八篇中的《宋高宗不耻自倂于伪楚伪齐而为金之附庸国》,有一处“□□□□不谙历史”,一处“而□□反颂秦桧为救时贤相”,一处“□□不察,乃欲援秦桧之例”。三处方框,很显然隐去的是人名。到底是谁,令人不解。而上引朱希祖1934年9月29日日记则给出了答案,前者是“胡适之”,后二者是“适之”。作为要出版的著作,朱希祖不便指名道姓,而写日记则无此顾虑<sup>⑤</sup>。历史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对历史的不同认识(不谙历史也是一种认识)能够导致对时局的分歧,反之亦然。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后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朱希祖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有明显的差异。朱希祖1941年12月16日在《上委员长书》中还提到这两部书,更直白地表达了他的撰述旨趣:“自日寇建立二伪国以来,内则摇乱民心,外则迷惑国际。在昔北宋之际,金寇侵宋,封建张邦昌伪楚国,刘豫伪齐国。不图今日寇全袭其法,以成此伪满、伪汪。希祖发愤之余,撰成《伪楚录辑补》六卷、《伪齐录校补》四卷,冀以发日寇之奸心,昭二伪之逆迹。业已脱稿,正在誊写。……付之刊刻,昭示国人,亦可以破二伪之逆魄,警日寇之迷梦。”<sup>⑥</sup>他对自己整理这两本书的重视程度于此可见。

朱希祖整理史书,以恢复其原貌为原则。但在这两部书中,他在金朝所建立的两个政权和张邦昌传、刘豫传前均加“伪”字,运用了春秋笔法,并对杨尧弼采纳春秋笔法表示了赞赏。

朱希祖与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学术争论,也是其民族主义史学特色的重要体现。朱希祖与陈寅恪是朋友,彼此相互尊重,但在唐朝皇室的族源问题上,两人有分歧,出现了学术争论。陈寅恪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断定李唐为后魏拓跋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的后裔,李唐自称西凉王李暠孙李重耳后裔是伪托。陈寅恪弟子刘盼遂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李唐为蕃姓考》。其后陈寅恪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说李唐先世本是汉族,始为赵郡李氏,而后冒为陇西李氏,但仍然认为是李初古拔的后裔。迨日本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驳斥金井氏“代北叱李为李”说,但仍坚持李唐为赵郡李氏之说。朱希祖对陈寅恪的观点并不认同,尤其是陈寅恪的观点为日本学者所利用,宣扬李唐皇族出于夷狄的观点,更让朱希祖受到刺激,认为有辩驳的必要。他撰写了《驳李唐为胡姓说》。此后,陈寅恪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其中有对朱希祖的回应,再次论证李唐为李初古拔的后裔不误。对此,朱希祖又撰写了《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陈寅恪没有再写文章答辩。关于这次论辩双方观点的孰是孰非,这里不展开评论。朱希祖之所以拂朋友之意进行论辩,实在是由其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使然。他说:“既云李唐为

①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66页。

②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70页。

③朱希祖《〈伪齐录校补〉自序》,《朱希祖先生文集》第4册,第2365页。

④《朱希祖先生文集》第4册,第2566—2567页。

⑤当然,也不排除朱希祖原稿中有人名,罗香林、朱倬出版《朱希祖先生文集》时故意隐去,而改为空格。

⑥转引自:朱元曙、朱乐川《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35页。

李初古拔之后裔,则无怪刘氏指为蕃姓,金井氏指为出于夷狄,详言之,则李唐祖先,实为东胡、鲜卑种耳。此与指明成祖为元顺帝子,同其谬误。若依此等说,则自唐以来,惟最弱之宋,尚未有疑为外族者,其余若唐若明,皆与元、清同为外族入居中夏,中夏之人,久已无建国能力,何堪承袭疆土,循其结果,暗示国人量力退婴,明招强敌加力进取。若果历史确实如此,余亦可无异议,然谛察之,实有不然者,此余所以不得不辩驳也。”<sup>①</sup>朱希祖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御用文人如秋泽修二之流以后就公然宣扬中国社会停滞论,认为中国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克服“停滞”,鼓吹侵略有理。关于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的争论,笔者曾详细梳理过<sup>②</sup>,此处不再赘述。朱希祖在谈到争辩的原因时,也是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来讲的。他说:“夫元代亡时,明成祖已生,其非为元顺帝子,彰彰明甚。今学者不信洪吉喇氏及甕妃为明成祖生母,而仍信硕妃为明成祖生母,则究其源,仍为元顺帝之子而已。此与李唐为胡姓之说,同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此不可不重为辩驳者也。”<sup>③</sup>对于这场争论,现代有学者以朱氏在史料上“过信官书”,治史理念过时批评他,实在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就史料观和治史方法论而言,朱氏与陈寅恪、傅斯年没有什么差别。他们具有学友、师生关系,平日交往论学较多,其不同之处仅在于把握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度之差异。这两个争论反映了朱希祖历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与强烈。

朱希祖 1940 年 3 月下旬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工作,担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刘成禺赋诗曰:“废绝梨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称赞他对重开国史馆所起的重要作用。1939 年,他代张继等人起草的《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议案》,亦被刘成禺赞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第一大文字”<sup>④</sup>。其曰:“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决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灭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古人有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则史亦必自灭,而后人灭之。”“自吾祖宗缔造历史,历代赓续,未有中绝,垂四五千年而光照天壤,世界各国无与伦比,国土之大,人口之众,皆受历史精神融铸,断然不可分割。为子孙者,岂可妄自菲薄,不为之继续撰述,传之无穷,而自侪于无史国家乎?”<sup>⑤</sup>这篇揭橥国难形势下国史资料搜集和编纂紧迫性的文字,文理密察,蕴涵了朱希祖情感丰沛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朱希祖晚年与张继交往多,两人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由于朱希祖 1943 年 8 月 6 日后没有再写日记,张继在日记中所记两人的谈话,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朱氏思想。张继 1944 年 1 月 8 日拟了整理中国历史的几条原则,其中不乏“华夷之辨”观点,诸如“本诸春秋大义,内中国而外夷狄”;“本诸顾亭林、章太炎史学精神,宋明之亡,直书为中国亡”;等等。张继写道:“持之访朱逸先君,与之商榷,彼以为然。”并认为:“以司马温公、朱元晦之贤,修史而不辨别华夷,推其原因,君主思想,入毒太深,以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中国正统虽亡,夷狄为君,亦可得一日之安。如王通之类,持此谬见,故见斥于顾亭林。”对于他的这一观点,“逸先亦以为然”<sup>⑥</sup>。这表明在朱希祖的民族观点中还存有早期革命党人的大汉族主义残余。

张继日记还记录了朱希祖对当代史学的评论。他 1943 年 12 月 15 日日记:“访逸先,论今日之历史学者,约分两派:一、致用派,亦谓教育派,如柳貽(翼)谋、缪凤林等;一为考证派,内分两支:一为怀疑派,如顾颉刚、陈寅恪等,一为证据派,如钱穆等。两者比较,以钱穆为稳妥。”<sup>⑦</sup>1943 年 11 月 26 日日记:“(逸先)又云陈寅恪虽精于史学,立异好奇,以唐太宗、明成祖非中国人之类,正其短处。”<sup>⑧</sup>张继所记的这些评论,既反映了朱希祖在历史研究上持折中稳健之主张,又说明了他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坚守。

①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 225—226 页。

②参见:周文玖《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史学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57—58 页。

③朱希祖《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硕妃说》,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 276 页。

④《朱希祖日记》下册,第 1168 页。

⑤《朱希祖先生文集》第 2 册,第 1013—1015 页。

⑥《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3 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5 年版,第 146—147 页。

⑦《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 143—144 页。

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 137 页。

### 三 科学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间的张力

以上论述了朱希祖史学的两个方面:既主张科学史学,用科学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又在历史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特色。从朱希祖的治史历程看,20世纪20年代,他偏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大力倡导建立科学的史学,到30年代以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他的历史研究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渐突出,看似走了一条从科学史学到民族主义史学之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朱氏放弃了科学史学而追求民族主义史学?不是的。因为在倡导科学史学之前,朱希祖史学研究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初步显示出民族主义史学特征;而其后期著史突出民族主义时,他也没有放弃科学史学的追求。他的《西夏史籍考》最初撰写发表于1929年2月,再次发表时间是1943年11月,并作了增补。他在重发序言中指出:“余尝谓史学家应超然于国家民族、政治党派、宗教学术流别、文艺风俗习尚之上,至公无私,了无偏倚,乃可尽其天职,合于科学。而吾国史学,好持正统偏安之论(谬见),对于己国,则自居宗主,妄事铺张;对于别国,则倨之藩属,过于删损,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观于南北朝之史,而叹当时史官之任情笔削,毁灭史实不少(也),盖此等态度在政治家固可权宜偏私,在史学家不宜随人短长也。惟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与正统,叹为至公无私,尝作文以纪之。”<sup>①</sup>也就是说,他20年代的科学史学之主张,到40年代依然坚持着。

朱希祖既坚持超然于国家民族、了无偏倚的科学史学,而其著述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本身就存在一种张力,因为科学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张力很不好把握,处理不好,容易形成自相对立。金毓黻是朱希祖的学生,金氏在评论朱希祖史学的这种二重特点时,表现出明显的反对前者、赞同后者的倾向。对于朱希祖在《西夏史籍考》序言中的反对正统偏安之论,金氏评论说:“朱先生此论,期期以为不可,《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为修史之大法,岂容紊之,历代修史者,详中而略外,扬中而抑外,此正本诸内诸夏外夷狄之旨,何可废也。……今谓脱脱之奉诏修三史各与正统,叹为至公无私,岂得谓为达论也哉?先生为余所师,其立论失当者,余亦不敢曲护,故为辨之如上。”<sup>②</sup>对于朱希祖与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争论,他赞同朱希祖,而批评陈寅恪在有关民族问题上的“率尔操觚”。他说:“研学之士为求知之念所趋,遇一题目分析务尽,否则必有不快之感,此常情也。然其题目如何,亦宜审度,果为一国家全民族所关,即使情真理当,亦不可率而操觚,以贻一言不智之讥,如刘盼遂撰《李唐为蕃姓考》即乖此旨。……按刘氏之说,实本其师陈寅恪。寅恪撰《李唐氏族之推测》,前后凡三篇,引据颇多,终谓李唐为汉姓,已知其初论失于一言不智。其弟子又推波而助之澜,后欲弥其阙失,遂至于再三辨说。然其积垢已如邱山,虽竭西江之水而不能浣也。朱先生之论,一驳吕夏卿《唐书宗室世系表》妄加事实;二驳释彦棕《法琳别传》之说为不足信。其立论设证似不如寅恪先生之有力,然已先其大,则其小者不能夺。设陈氏立论之初思及此义,称量而出,必不致贻一言不智之讥,又不劳再三设论以为之补救也。余前晤孟真,首论及此,然不知外人曾著论,援据以益证成其说,今论(读)朱先生之论乃得知之,然则先生之论真先得我心哉。”<sup>③</sup>此处“外人”系指日本学者。但在重视考据求真之学的时期(包括当代),朱希祖突出民族主义的做法,又很容易被批评为观念陈旧、以论代史。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有其合理性,然又都存在偏颇。

朱希祖说:“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sup>④</sup>这个论断最能代表他对史学的完整认识。考订历史事实是基础,探讨历史规律、用于服务社会和人生是归宿,此乃史学之“两端”,并且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此史学之两端,他都有一些论述。他说:“夫史学之所贵,首在谋史事之近真,终须明历史演进之轨迹,使人自为比较,而自图进取者也。”<sup>⑤</sup>“历史之目的,不在乎记忆过去,而在乎观察未来;尤不在乎摹仿过去,而在乎创造未来。”<sup>⑥</sup>“新史学与新文学同,求善求美,而

①朱希祖《西夏史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1期,第25页。朱氏此文首发于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1929年2月15日第16期,第4张第14版。按:引文中的波浪线系引者所加,而加有波浪线的文字与首发序言中的文字大致相同,括号内文字为首发时的文字。

②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114,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974—4975页。

③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91,第3903页。

④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347—348页。

⑤朱希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序,南京图书馆藏《朱希祖文稿》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296页。

⑥朱希祖《清代通史》叙,萧一山《清代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更应求真。”<sup>①</sup>朱希祖鲜明的民族主义史学特色,是其主张史学经世在国家、民族问题上的反映。其实,在阐扬民族主义的史学论文中,朱希祖并没有以牺牲史实而维护“正统”观点,就像他所说的,“若果历史确实如此,余亦可无异议,然谛察之,实有不然者,此余所以不得不辩驳也”<sup>②</sup>,他还是运用丰富的史料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因此,科学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在朱希祖这里,具有统一性,而不是割裂和对立的,只是危险的时局使之将重心倾向民族主义史学一端而已。

当然,朱希祖史学论著中未能摆脱“华夷之辨”观念,不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倾向。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朱希祖师承章太炎,与国民党元老张继过从较密,民族观不免受他们的影响。抗战期间,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宣传爱国思想,激发团结御侮精神,往往借用儒家的“华夷之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做是有弊端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1939年底至1940年,在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中,回族学者白寿彝就对利用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激励民众爱国情绪的做法很不赞同,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全的心理。可是,生活在国统区、敌占区的大多数历史学者,包括陈垣、金毓黻、傅斯年等,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对朱希祖民族观的局限性,需要指出,但似不宜夸大与苛求。

## Exploration of Zhu Xizu's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Zhou Wenjiu

School of History,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storical Theory & Historiogra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Zhu Xizhu was an influential histori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he advocated the use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to study history beyond the prejudices of party, nationality and state, to examin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laws of human evolution, and reflected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on the other hand, his writings hav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emphasizing national integrity, expounding national spirit and caring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ation. These two aspects of his proposition are both tense and unifi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nd the critic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Zhu Xizu's historical works failed to avoi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reat Han nationalism.

**Key words:** Zhu Xizu; 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tens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

<sup>①</sup>傅振伦《先师朱邇先生行谊》,《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11、12期合刊,第47页。

<sup>②</sup>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226页。